

书法应用于留学生汉字学习的 价值澄明与融合之法

The Value of Calligraph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 Exquisite Blend of Clarity and Fusion

王昕¹

Xin WANG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821597931@qq.com陈苗苗²

Miaomiao CHEN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miliac0207@163.com

摘要 汉字是汉语的符号载体与交际工具，兼具较高审美价值与传播意义；然而“难认、难读、难写”等问题却长期存在于对外汉字教学之中且并未得以有效解决。书法作为中国汉字的艺术呈现形式，将其应用于留学生汉字教学中可彰显以下双重意义：一方面辅以字“形”，另一方面佐以字“意”，实现结构形式、意义内涵双向互动进而拔擢留学生汉字学习能力，亦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
文化，切实感受中国“汉字美”。本文着眼于当下留学生汉字学习困境，试从相适性角度分析书法
教学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现实价值，并给予书法教学嵌入留学生汉字课堂的融合途径，以期突破留
学生汉字学习障碍，赋意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良性发展。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书法教学；留学生汉字学习；价值分析；实践路径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symbol carriers and communication tool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old significant aesthetic and communicative value. However, the challenges of recognizing,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persistently hindered the effective teaching of th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 students. In this regard, calligraphy, being an artistic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play a dual role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 students. Firstly, it supplem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s "form", and secondly, it enhances the comprehension of its "meaning." This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al form and connotation of calligraphy facilitates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enables them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sequentl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not only acquire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aracters but also gain insights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ppreciate the

收稿日期：2023-10-13

作者简介：¹ 王昕，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硕士研究生。

² 陈苗苗，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硕士研究生。

beauty of th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ims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in overcoming these difficulties. It propo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corporate calligraphy teaching into Chinese character classroom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the objective of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to their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sustainable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alligraphy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alue Analysis; Practical Paths

当今世界，文化日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伴随国家“走出去”外交政策施行并日益深化，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世界各国意欲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与日俱增，留学生体量愈发庞大，“汉语热”持续升温，学中文、用中文在已海外蔚然成风。从外部环境看，“一带一路”外交政策的持续深化为留学生进入中国课堂打通便捷通道；从内在发展看，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正式将“对外汉语”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旨在适配教学对象向更广泛的留学生群体过渡趋势，可见海外中文教育受教群体逐渐向来华留学生倾斜。但汉字一向是中文学习过程中的重难点之一，留学生对于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群体共识一定程度上黯淡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前景。面对“汉字难学”这一论断，本文认为将书法教学引入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书法学习对于汉字习得具有辅助记忆作用和多元促进作用，可从传统文化层面激起留学生汉字学习的隐性动机，纾解其畏难情绪；另一方面，书法作为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瑰宝，是一种辐射性和架构性极强的艺术派别，在增强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群体认同感的同时承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绝佳切入点。

一、留学生汉字“难学”困境与原因分析

汉字的多维价值决定了留学生学习汉字具有必要性。首先，汉字具有文化价值。唐代孔颖达有言曰：“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此句阐明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任何中华精彩传承传播的途径均离不开汉字这一文化载体。汉字的演变史俨然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其漫长的历史渊源使汉字超脱了简单符号系统的性质，逐渐演化成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一大典型标志，饱经风霜而不改，历经磨难而不衰。其次，汉字具有学习价值。汉字是培育留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主要符号载体，亦是口语交际能力得以提升的必备条件。2021年《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明确将中文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作为衡量语言学习者中文水平的依据，新HSK不同于旧版只在高等阶段考察汉字书写能力，自三级开始便设置汉字书写考题，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最后，汉字具有审美价值。汉字滥觞于中华民族对自然的尊重与认识，代表华夏子孙最古老的审美理念，规定在方格中的汉字描摹着中正平和的君子之风与和谐平衡的生存态度，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国民精神。一言以蔽之，于留学生群体而言，汉字学习是其了解中华文化、接受中文教育的必修课，在对外汉语教

学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

但目前“汉字难学”作为语言界的国际性课题，不仅影响着留学生汉语学习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语全球化推广进程。究其根本，“汉字难学”之共识源于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比较。周有光先生认为“汉字难不难”这一问题的提出来源于十九世纪末期与外国拼音文字的接触，发生了二者的比较以及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文字工作效率的要求(周有光, 2002)。除此以外，亦可从客观及主观因素两个角度深入阐释汉字“难学”困境产生的原因。从客观角度出发，汉字本身特有的多重属性以及各结构系统的复杂特征等汉字内在要素，以及对汉字教学重视程度不足、学生兴趣栽培意识不强、汉字教学方式不清等教学外部因素均对留学生汉学习得产生抑制。从主观角度出发，学习者自身的母语思维定势、与本土文化认知模式相悖和跨文化交际下的国别文化差异等现象，致使留学生主观层面的学习情感过滤不断发酵。

(一) 留学生汉字“难学”的客观原因

1. 汉字字形结构复杂与汉字表意属性迥殊

汉字类属表意体系的文字，形、音、义三者于一体且没有必然的联系，字数繁多，笔画多样，笔顺严谨，结构复杂，字形迥殊，经历了悠久繁复的演变过程，汉字自身的特性决定其“难写、难读、难认”的事实。

首先，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最小结构单位，现行汉字基本笔形虽然只有五种，即横、竖、撇、点、折，但该五种主笔形在不同位置出现时会衍生出多种变体，笔画之间又有相离、相接和相交三种组合方式，多数汉字是综合运用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而构成的，大部分常用字笔画均在7画之上，有限的笔画借以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变种组合为多种部件。部件是高一级的构字单位，是汉字的预制构件，汉字根据部件的数目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两类，独体字由笔画直接组成，仅有一个基础部件，而合体字则由两个基础部件结合构成，部件间的组合方式又可细分为左右、上下、包围、框架及品字组合五种，上述前三种组合方式又可再细化，500余种部件与13种结构类型相搭配，依据“笔画—部件—整字”的三重递进关系形成了数量繁多的汉字。从汉字的字形整体来看，呈形体复杂的方块结构，不同于字母文字可以用简单弧线或直线线形书写出来，具备方块字特有的空间感。换言之，笔画和部件的多样性、笔顺的严谨性与字形的特殊性是汉字“难写”的关键要因。

其次，汉字是世界范围内现存唯一的表意文字，大量汉字从视觉上表现不出其语音。虽然当前汉字向着表音趋势的方向迈步来弥补纯粹表意体制的不足，同时运用了表意兼表音两种表达方式，由表示字音的部件和表示字义属类的部件联合构成，但这并未改变汉字仍属于表意文字范畴的属性。同时，形声字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四分之一的形声字的读音和声旁完全一致。此外，一方面，汉语有大量的多音多义字和多音同义字，词性不同读音随之不同，例如“长”作形容词时读cháng，作动词时读zhǎng，诸如此类实例生活中比比皆是；另一方面，

文言文延续至今，其中的通假字兼有多种读音，有些字在独立成词时和构成复合词时或者充当姓氏等特殊用法时读音亦有不同。“见字不识音”的现实及多音字的大量存在使得汉字“难读”成为毋庸置疑的命题。

最后，汉字笔形的相似性、组合的多样性以及书写空间的局限性使其衍生出极多形态相近的字但意义有别的形近字。形近字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别：笔画相同但位置有别，如“人”和“入”；字形相近但笔形有异，如“天”和“夭”；字形相近但读音不同，如“治”和“治”；字形相近且读音相同，如“燥”和“躁”；部件相同但位置不同，如“吴”和“吞”，这无疑构成了留学生汉字习得进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也是导致汉字“难认”的缘由之一。有学者研究表示，对来自汉字文化圈如日本、韩国的留学生而言，介于字源上的同宗关系，其母语中存在一定量的汉字形近字，甚至形体完全相同但却记录着相异的信息，不利于其对汉字的辨认和识记。而对于西方留学生而言，汉字犹如一幅幅神秘的图画，不易察觉汉字内部的细微差异。一言以蔽之，汉字“大字符集”的庞大容量与以上诸多特征交织使得汉字学习产生“三难困境”，是由于其自身特性所建构的客观屏障。

2. 汉字教学地位矮化与汉字教学方法错位

卞觉非教授针对“对外汉字教学”作出了具体定义：对外汉字教学以外国人为对象，以汉字为内容，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根本目的是讲清现行汉字的音、形、义，帮助学生认读、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书面语(卞觉非, 1999)。目前学界已在汉字教学领域聚焦了诸多视线，但不可否认汉字教学体系仍存在若干欠缺之处。

首先，汉字教学未得到与其价值相匹配的重视程度，在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处从属地位，汉语教学倾向存在“两重两轻”景象，即重口语、重阅读，轻汉字、轻书写，汉字课堂作为选修课或综合课的一部分。教师教学着重于汉语的情景和交际能力本无可厚非，但其厚此薄彼的教学惯习，令留学生的汉字学习恰合“木桶效应”成为短板牵制汉语学习全局。以广远之论，汉字乃至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留学生贡献传播与舆论力量，因此留学生汉语教学结果绝不能仅仅是中文的使用者，而应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全面均衡的学习者。

其次，受制于汉字教学的课堂形式单一以及课程、教材资源开发尚未臻于完善，现代教学手段的直观作用发挥不到位。从字形出发部分学者提出将集中识字法和分散识字法运用于对外汉字教学。集中识字法更多涉及汉字构型与基本规律，学习内容相对枯燥无味，极大可能磨灭留学生的积极性，而且汉字多音、多义现象众多，对留学生识字回生率要求高。分散识字法缺乏系统性并且无法凸显汉字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和主动性，识字效率低、进度慢、周期长。从文化出发利用六书理论或汉字字形演变脉络观照汉字意义的保留、引申和变换可从意义建构角度助力汉字学习，但文化的广度与深度需要我们斟酌如何把握文化因素在汉字教学中的尺度才不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效作用，同时文化教学一向为其他教学手段的辅助者，尚未形成

独立的一支。可见从形和意两方面融合字形与文化两个角度创建汉字教学方法，才能找到事半功倍的杠杆点。

再次，长期以来汉字教学未能按汉字本身特点和规律进行教授，对外汉语教学体系未能在整体设计上处理好汉字教学和结构教学、功能教学的关系(李大遂, 2008)。汉字教学与结构教学的关系实则“字本位”理论与“词本位”理论的关系。西方语言向外传播的可追溯历史的确更为久远且建树颇丰，他山之石虽可以攻玉，却也不能食洋不化，“词”是西方语言的舶来品，单纯走“词本位”的教学路径不符合汉字的土壤，虽能起到短期速成的功效，但汉语中词和语素的区别、词类和词的结构类型的界定往往众说纷纭，对受到母语影响的第二语言习得者造成了极大困扰。徐通锵提出“字本位”的汉语言研究，他认为字的特点是语义核心，音节的音义共联和汉语的最小表义单位，要以字的研究为基础，以它为枢纽性的衔接点，继承传统，实现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交融(徐通锵, 2005)。如开课教授日常生活的招呼用语“你好”，但“好”这个字的习得应该置于学生汉字课上学习“女”和“子”以及汉字的间架结构之后，“语和文先分后合”的教学模式相较于“语文并进”的单轨教学模式更契合留学生汉字学习的轨迹。

最后，对留学生汉字教学的方法缺乏针对性和趣味性，大多数课堂将国内学生的汉字教学模式直接迁移至留学生课堂上，盲视学生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本土的汉字初学者而言，很多字虽不能认但能说，汉字学习是一个“对号入座”的过程，而留学生普遍缺乏长期的汉语语境，需要针对其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制订适宜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激发汉字学习的热情。

(二) 留学生汉字“难学”的主观原因

1. 学生心理情感预设与汉字文化传播异轨

实验心理学家 Treichler 做过一个关于人类获取信息来源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中 83% 来源于视觉，因此对于以西方语言为母语的留学生而言，刚接触汉字时最大感触应为视觉冲击，汉字的形体与西方语言可谓云壤之别，汉字是方隅之间的二维空间架构，而西方语言呈单一、有序的直线型排列，视觉映像的复杂程度有高低之分，在对比性冲击后心理层面便产生因第一印象效应所导致的难度预设。所谓第一印象效应也被称为“首因效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即个体对最初接收到的信息的感触会影响之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模式，人们知觉中留下的第一个印象能够以同样的性质影响人们再一次发生的知觉(刘广灵, 2008)。第一印象不符合其视觉习惯的陌生感，加之留学生普遍存在“汉字难”的刻板印象，其心理层面便由此产生汉字学习的消极情绪与畏难心理。此外，拼音文字与汉字在人脑中的处理机制存在差异，以拼音文字为母语背景的留学生，他们的脑处理机制往往传输语音编码刺激大脑左半球，因此拼音文字被称为“单脑文字”。汉字作为一种图像性文字在传输过程中必须调动右脑的字形编码及意义编码，同时刺激大脑左右两个半球，呈现出大脑左右脑协同工作的双脑均势景象，被称为

“双脑文字”或“复脑文字”（郭可教&杨奇志, 1995），汉字更为复杂的脑处理机制也增加了留学生对汉字学习的难度预设。

汉字是承载中国文化的介质，对外汉字教学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涉出，这便触及跨文化传播与交际视域下的对外传播。文明自成板块，当与异质文化进行沟通时便如同板块碰撞般，难免招致对立抗衡的局面。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包括非言语编码和暗码信息较多的含蓄内隐性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而通过语言可实现清晰表达，无须借助环境对含义加以推测揣摩的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张洪铭, 2023）。汉字的文化载体性、时空交织观、形体演变史赋予了其高语境文化属性，低语境文化向高语境文化的传播是一种自然流动，而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输入却是一种逆向楔入（于晗&周晶晶, 2022）。对留学生而言，汉语教学作为一种逆向文化输入，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必然出现传播路径不合轨的现象。留学生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不断对自我文化认同产生再认同，过程中因国别文化差异的情感过滤导致为其汉字学习蒙上隔阂。

2. “汉字文化圈”内外有别的迁移模式与感知方式

“文化圈”为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从结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地理区域（贺友龄, 1999）。“汉字文化圈”则指的是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身处“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会在不同程度上承受母语文化的迁移作用从而体现出一种群体差异性。“迁移”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的是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产生的影响，如硬币之两面，可分为起促进作用的正迁移和起阻碍作用的负迁移。美国行为主义语言学家罗伯特·拉多在对比分析假说中认为共性是产生正迁移的基础，差异性则是负迁移的来源，但两种语言的相似性同样易使语言学习者产生混淆进而构成二语习得的瓶颈。过去我们把眼光聚焦在非汉字文化圈，知晓拼音文字与汉字差异悬殊，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障碍重重，认同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的教学及其研究是汉字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当视线转移至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它们通用语言同汉字一样具有方块字的特点，且在其社会生活中常常出现汉字，我们往往认为汉字文化圈内的留学生在汉学习得时具有优势，但根据“迁移理论”，其母语文字与汉字的共性和相似性在带来正面效应时同步招致负面作用，身处汉字文化圈内的留学生不仅需要克服汉字的语内干扰，亦需抑制母语文字对其造成的语际干扰。由此可见，不论是来自汉字文化圈还是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均因对汉字的认知有所差异进而对其汉语学习构成难关。

此外，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在汉字识别过程中倾向于从整体上认知，认为汉字是由无序的线条组配而成的图画，这反映出格式塔心理学下的“整体观”。格式塔在德文中的意义为“完形”，强调整体优先原则，即人们总是倾向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作为一种表意的视觉文字体系，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完备的形体，均是由笔画、部件组合成的“格式塔”，具有整体性和图像性特点。汉字的二维方块空间架构以及笔画排列风格使其具有共时观念下的“图形

美”，且汉字本就从象形图画文字历时演剧而来。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通常将注意力放置在汉字的整体轮廓上而疏漏了作为组配单位的笔画和部件，必然影响字形特征的完整提取，因此无法从汉字的理据性视角进行理解，这就致使大量留学生认为汉字难以识记。

二、书法教学于汉字学习的价值分析

教与学，本为课程的一体两面要素，教学对学习一定要具有强相适性，课堂才能良好开展，教师教学对学生学习才会有价值体现。而书法与汉字关系源远流长，将书法引入对外汉字教学的课堂，使得书法教学与汉字学习生发两者之间的适应性关系，方可达到化繁为简、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书法源自中国，以汉字方块结构和线条变化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书写工具，以简练的线条走势来表达复杂的意境情趣，业已成为中国四大国粹之翘楚。张岱年先生曾评价：“在诸艺术门类中书法最具中国独特性。”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称其为“艺中之艺”。一方面，从“文字—六书—书法”这一递进逻辑来看，汉字是书法的本体，书法艺术的孕育与汉字的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从汉字“六书”之“书”至“书法”之“书”，这既是一脉相承的结果也是质的拔擢。书法是汉字独具特色的表达形式，是被艺术化后的汉字，对汉字的沿革起到了规范性作用，给汉字注入了生命活力，同一个字用不同的书法体式撰写，能带来大异其趣的视觉体验。另一方面，汉字沿着简化和线条化的趋势演变，也为书法艺术的落地生根供给了土壤，使书法兼具结构美和线条美。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载体，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展演进程之中，以其迥殊的形态将这历史性的嬗变过程留存下来，从一种单纯的书写模式演化为不断继往开来传统艺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汉字生发与书法创造、汉字演化与书法变化、汉字形态与书法意态紧密联结的观照下，将书法元素嵌入课堂并构筑汉字教学的桥梁兼有语言属性及文化属性双重属性，利于留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的同时，可凭借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和深厚的底蕴启发留学生汉字学习的热情，激起其了解中国文化的内驱动力和隐性动机，足见建构完备的书法课程体系对汉字教学及文化教学具有辅助意义。

(一) 对留学生字“形”学习的价值彰显

汉字形体结构可分为三级：笔画、部件、整字，汉字学习必须逐级攻克，将上一级的基础作为下一级的根柢。书法按照汉字的成字规律用点画线条交叉组合结体，将书法艺术融入汉字课堂中可对留学生更好掌握汉字字形起到镜鉴作用。提及中国书法，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往往是别具一格的工具——毛笔，用毛笔进行书写的书法为软笔书法，软笔书法讲求审美价值，聚焦于字体的流畅性、线条性、整体性及艺术性，对汉字的笔法、结构和章法有着一定的准则要求。但硬笔书写工具如钢笔、铅笔、圆珠笔等的实用性、易得性、可控性往往更强，留学生学习汉

字的主要目的是达到用硬笔流利自如地进行交际。因此以书法辅助笔画笔顺教学可采取硬笔笔画教学为主、软笔笔画教学为辅的路径。

从汉字笔画来看，笔画可类比拼音文字的字母，是汉字的基本构成单位，亦是汉字学习的开端。卫夫人的《笔阵图》是针对笔画的书法论著，阐述了执笔、用笔的方法，列举了七种基本笔画的写法，文章开篇“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可见笔画之重，本固枝荣。传统的汉字基本笔画有八种，被称为“永”字八法，是中国书法用笔之法则，即：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弩、钩为趯、提为策、撇为掠、短撇为啄、捺为磔，渗透“近取诸身”之理念，每一笔画之形均可从身体之动态为切入点，“永”字八法有助于留学生具像化理解汉字书写中各个笔形。以泰国留学生为例，泰语绝大部分带有“小圆圈”，书写时总是由“小圆圈”开始一笔写成，例如 *ஷ*、*ஷ்*、*ஷ்்*、*ஷ்்்*；而不带有“小圆圈”的泰文的书写方式则是自下而上，这种有别于汉字的书写方式使学生在汉字书写过程中易出现逆向行笔、倒插笔及连笔的普遍性错误。黄兴亮将“永字八法”运用于曼谷奇诺罗中学学生汉字书写的实践之后学生书写汉字书写错误现象明显减少，错误率明显降低（黄兴亮, 2017）。

从汉字偏旁来看，偏旁是组成合体字的结构单位，多为合体字的一级部件。汉字虽是一个数额庞大的字符库，但偏旁的数量却是有限的，形声字由表示字义类属的形旁和表示字音的声旁构成且汉字中形声字比例最高，因此偏旁学习能对汉字习得起到授人以渔、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对所教合体字的偏旁或者部件加以解构、重组和归类，使学生在下次遇到同偏旁的字时知晓如何用笔及结体，当“木”在左右结构的合体字中充任偏旁时，最后一捺要变形为点，为其右的部件预留穿插的空间；而当“木”在上下结构的合体字中充任偏旁时，撇、捺两笔要尽量舒展，竖画距离应缩减，以便笼罩其下的部件，正确撰写偏旁在不同位置的变形写法方可使字的结体更优美。此外，形声字中形旁的主要作用是表示字的意义类别，可帮助留学生了解和区别字的意义，以“扌”为形旁的字通常同手的动作行为有关，如“打、扛、扔”等，因此在进行偏旁教学时不妨将书法字帖引入课堂作为媒介同时学习一批同偏旁的汉字，深化对字形结构和字体意义的理解从而提高识记能力。

从汉字整体结构来看，汉字书写的过程不是简单堆砌笔画的过程，而是有规则的建筑过程，整字教学可与笔画教学相结合，教授横画时可引申出“一”字，教授竖画时可与横画相结合书写“十”字。同时用软笔书写的整字相对于硬笔而言字形较大，笔画及部件的排列更为直观明晰，可减少留学生在笔画及部件的改换、增损、变形方面的偏误，进而使其汉字书写更加正确、匀称与美观。此外，书法字帖有田字格、米字格、回宫格以及方格等不同式样，对于汉字书写具有不同的规范作用。田字格内有竖中线和横中线，硬笔对“横”画书写时只需参照横中线从左向右稍向上倾斜即可，米字格在田字格增加了两条对角虚线，可作为撇、捺、点等笔画的参

照, 将笔顺以及各笔画具体的书写走向鲜明地展示给留学生, 从“智育”角度掌握汉字并从“美育”角度培养留学生对书法的审美欣赏。

(二) 对留学生字“意”感悟的意义澄清

书法艺术是由多项审美对象共同建构的: 一为可视觉化的笔墨线条, 二是反映抽象意蕴的章法气韵, 三是书法多层次化的“意”。狭义的“意”可解读为“意思”, 是利用书法艺术表现形式助力汉字意义的阐发, 因此在留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 书法可从汉字的本意领悟角度对其学习起到协助作用。“六书”是中国文字学用以概括汉字构成与使用方式的经典理论, 最早出现于《周礼·保氏》, 而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后世则采用许慎之名、班固之序, 将“六书”划归为: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清代学者戴震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四体二用”。其中, 象形通过描绘事物形状来表示字义, 以象形造出的字像一幅幅写意的简笔画, 最能体现汉字表意的特征且具有趣味性。形声字的形旁基本为象形字, 故而有着相同形旁的汉字可归纳为一个字族, 从中归纳出其共同义素, 执简以驭繁概括出这一批汉字的意义范畴。文字之形、义间的联系如若是非任意的则表明其具有理据性, 汉字具有理据性且表现为部件与整字之间所具有的“形—义”之间的关联性。而指事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上添加提示性符号来表示字义, 会意则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意符并将其意义组配而成新字之意。由此可见, 象形字生成自人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共同认定或假设的现实, 作为造字之基础与其他造字法具有极高关联性, 基于象形字近似于图画的特质以及汉字具有理据性的事实, 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采用形象描绘法和字理讲析法, 让留学生利用书写方式直观感受汉字的根本义。

而广义的“意”可上升为中国文化之“意蕴”, 是利用书法艺术形式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在留学生汉字学习的过程中助其在笔尖游动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首先, 书法艺术涵括中国书法史、书法理论以及文化用具使用等多方面的内容。书法从殷商以降的千年历史中历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性演变, 以各异的形态反映出各时代之精神, 清代书法家梁巘于《评书帖》中发表一则著名诗论: 晋人尚“韵”, 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 元、明尚“态”。历朝历代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书法作品均是其时代风貌的俱现, 如魏晋时期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展现的自由豁达、放逸舒适的飘逸书风, 从笔法和内容两方面传达出超然物外、淡漠仕途的魏晋风度, 可见书法作品之气韵有助于留学生体悟中化历史发展脉络与特殊历史背景下传承至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次, 人文价值是书法文化艺术的精粹, “字如其人”之说表明书法作品能够彰显其背后作者的审美情趣及精神诉求。颜真卿素来坚持书以载道、文以铸魂, 于安史之乱中以身殉节之典故诠释了崇高的中国文人风骨, 其作品《祭侄文稿》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 是无意于佳乃佳、叹为不可企及的神来之作, 通篇内容壮怀激烈, 书法气势磅礴, 涂改之处的不完美反倒体现了一种悲愤难抒的别样之美, 书法作品背后的故事亦有助于留学生了解名人气节, 感受人文精神。在书法观摩与实际练习过程中,

汉字并非仅仅作为形式符号存现于课堂教学场域，而是为留学生建构起极具艺术风格，相融魅力、创新魅力、品德魅力兼而有之的中华文化空间，可实现对留学生的感染教育，助其塑造人格并推动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传承发展（鲁馨遥，2015）。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字艺术，浓缩着字形之美，荟萃了文化之意，在深厚的文化内涵蒙阴下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在书法教学融入汉字课堂时，不仅可作为留学生理性化书写汉字的摹本，也可作为其感性化理解汉字本意与内蕴的工具，在满足留学生“能写字、写好字”的教学目标基础上，拓展留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知识了解面，助其从墨香中感悟中国历史的文人气息，在笔尖上体会传统文化的多样色彩。

三、书法教学融入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可行路径

目前海外汉语学习的热潮方兴未艾，但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仍存在概念不明、定位不清、体系疏漏等疑难，致使汉字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体良性发展脱轨。以下通过“四个结合”为解决汉字教学困境提出建议。

（一）教学模式：分类教学与分级教学相结合

教学模式是教学目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教学活动框架，将书法引进对外汉字教学需处理好宏观教学活动整体与微观的语言板块、文化板块的关系。书法教学内容可分为书法知识与书写技能两大模块，书法教学沿袭了对外汉语教学以技能训练为主、理论讲解为辅的路径，在具体教学进程中需要因材施教、量体裁衣，针对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进行分类教学、针对教学对象的语言等级进行分级教学（郑博仁，2012）。处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拥有长期借鉴或直接使用汉字的历史，其现行字体与汉字在形体上也赋有方块字形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书法在汉字文化圈中具备广泛受众，不论在物质层面亦或精神层面均深受中国文化深厚内涵的熏染，两者文化的同质性消解了文化的物质载体——语言传播的障碍。因此，来自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一般高于汉字文化圈外的留学生，能够相对轻松地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应拓展书法文化知识教学的比例。但对于来自圈外的留学生而言，中外具有悬殊的语言形式、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文化与思维差异进一步筑起语言传播的壁垒，书法必须从具有普世意义的艺术价值层面为汉字传播作出贡献，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书法的语言属性，缩小文化教学的比重、走技能教学为主的模式，秉承文化教学服务于语言教学的原则，将书法教学在汉字学习的热情激发、汉字识字写字方面的辅助作用置于首位。

（二）教学手段：传统课堂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

教学手段是师生实现课堂教学的辅助性中介工具，将书法教学引入留学生课堂应实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协同运用。书法以汉字为物质依托，以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为书写媒介，以中国哲学思想、宗教主张、诗词歌赋为精神内蕴，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

人文修养的综合性艺术符号,这决定了书法具有历史属性。另一方面将书法工具运用于汉字教学之中可充分发挥汉字“图画式”文字的优势,因此书法教学必须保留传统教学的特色,由教师亲身示范各字的结构和章法,学生临摹以加深对汉字形体的认识和体悟。得益于现代教育技术的高速发展,多媒体教学途径进入书法教学的课堂之中,集图、文、音、像于一体,具备传统教学无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添补了传统书法教学缺乏的形象性,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与直观性,施展了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下的文化输出方面的独特优长。例如汉字笔画笔顺的演示、汉字形体的变革、优秀作品的欣赏、书家故事的模拟等抽象内容均可利用多媒体实现具象表达。此外多媒体可实现师生间实时双向互动,学生可以将学习成果及时提供给老师从而获得更为针对性的指导,教师亦可给予反馈并拓展教学网站和资源实现自助式学习模式。

(三) 教学内容:楷书入手与隶书辅助相结合

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中同师生发生交互作用、有意向学生传递的主要素材,教师可将不同书体运用于对外汉字教学的不同阶段。汉代之前是书法的萌芽时期,经过隶变笔画的概念得以产生,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魏晋是书法诸体得以完善的时期,隋唐书法艺术迈入鼎盛时代,之后经宋元明清,书法的规范性与符号性更加完善。在这一嬗变过程中,书法形成了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五种书体,楷书是通用至今的标准字体,又被称为真书、正书,“楷”即为“楷模”之意。对于汉语初级阶段的留学生而言,楷书横平竖直、笔画规整,笔画之间没有连笔,更符合汉字平面型方块体文字的属性,易于辨认且学习起来比较简单,目前使用的汉语教材以及汉字考试的印刷字体也以楷书为主,因此可成为留学生汉字习得的入门字体。而隶变是汉字由象形的古文字向不象形的今文字的转换点,隶书上承篆书下启楷、草、行,可见楷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逐渐成为规范的。中国书法归根结底是可视觉化的笔墨线条,书写过程中能否运用好中锋和绞转决定了书法作品线条的质量,隶书撇、捺、长横有波折,承继了篆书此两种笔法却又摒弃了篆书仍有异体字的缺陷,因此在留学生书法学习的后期可将隶书引入教学之中来发挥书法的文化属性。

(四) 教学保障:教材规范与师资要求相结合

教学保障是旨在完成教学任务所采取的各种保障措施,为保障对外汉字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对教材及教师等要素加以规范。教材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两个关键点,目前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仅出现在中国文化课本的单一章节,书法教学的字帖多沿袭国内书法教学的教材,专门介绍书法知识和技能的外语教材与双语教材寥寥无几。教材编写应遵循“五性”——系统性、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性,对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进行分类分级编写,可以结合汉语水平考试“三等九级”的具体大纲制定各阶段字帖,利用现代普通话对书法知识进行新说并加大译介程度及准确度,从而在书法知识外宣的过程中形成合力。与此同时,教师作为连接教学过程以及学习主体的桥梁在

汉字对外传播过程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目前对外汉语教师人才辈出，在高质量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具备书法知识与技能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凤毛麟角，国家汉办在 2008 年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师应了解中国书法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因此可以将书法技能作为教师综合素质考察的一项制定录用加分标准，从而为构建并推广对外汉字教学的书法体系创造生发条件。

四、结语

当下，现代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令人与人之间实现即时随地的信息交互，手机打字取代了昔时舟车劳顿的书信往来，交际成本得以缩减的同时提笔忘字之迹象愈发显著，汉字书写机会的减少使得汉字习得缺失练习的土壤，令留学生学习汉字“难上加难”。但汉字所蕴含的独特艺术性赋予其形式美、音韵美与诉诸直觉的灵性，是“难学”背后“易学”的钥匙(施显生, 2005)。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库中的瑰宝浓缩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等各艺术类别所具有的共性，同时又展露出其独特的风格和艺术价值。完备对外汉字教学中的书法教学体系不仅有助于留学生汉字习得进而助力于汉语的向外传播，书法作品的内容载体和形式载体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书法教学也具有发扬传统民族文化教育的功用，完美适配并迎合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本文重点谈论了书法的语言属性及文化属性在留学生汉字学习进程中的作用，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凡事物均有其两面性，将书法作为切入点也可能致使如下弊端的产生：留学生沉迷于字体的美观而忽视了文本的内容和意义；教师要求学生按照比较严格的要求进行书写从而拖慢了读写过程；学生需要熟练使用毛笔并按照书写规则进行摹写、润色与创作，程式化特性使学生产生疲倦心理，违背了通过书法激发学生隐性动机的初衷。

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向内传承和向外传播方面遭到冲击形成了一层裂痕，有些国家甚至“拿走”中国文化稍加改良包装为本国独特文化，文化上的隐形竞争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的潜在危机，将书法教学引入对外汉字教学是脱离泥淖的有效路径，可以通过留学生这一广泛的受众群体来提高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面。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建构完备的书法教学体系是应然与必然，作为一项艰巨且长久的事业，不可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来解决目前存在的困境。鉴于汉字为形体复杂的方块结构的特点，书法教学可从汉字形体的三层结构——笔画、部件、整字构筑留学生的图形认知。此外书法可利用汉字为表意体系文字的属性从六书着手推演汉字的意义框架，待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及书法水平有所提高时可在教学中嵌入其中的名家名事以及人文内蕴，创建对外汉字教学与学习的良好生态。

参考文献

卞觉非. (1999). 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语言文字应用* (01), 72-77.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

5397.1999.01.011

郭可教,杨奇志. (1995). 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报* (01), 78-83. https://doi.org/CNKI:SUN:X_LXB.0.1995-01-010

贺友龄. (1999). 汉字与文化. 警官教育出版社.

黄兴亮. (2017). 应用“永字八法”辅助对泰汉文字书写的实践与效果评价(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901&filename=1017216545.nh>

李大遂. (2008). 关系对外汉字教学全局的几个问题.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02), 1-11. <https://doi.org/10.16131/j.cnki.cn44-1669/g4.2008.02.001>

刘广灵. (2008). “第一印象”的信息机制及其激励效应分析. *中国软科学* (12), 105-113+145. <https://doi.org/CNKI:SUN:ZGRK.0.2008-12-015>

鲁馨遥. (2015). 汉字书法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7 (S2), 176-177. <https://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15.s2.067>

施显生. (2005). “汉字难学论”与比较方法论. *课程. 教材. 教法* (11), 92-95. <https://doi.org/10.19877/j.cnki.kcjejf.2005.11.023>

徐通锵. (2005). “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06), 5-15.

于晗,周晶晶. (2022). 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的路径与策略. *人民论坛* (07), 120-122. <https://doi.org/CNKI:SUN:RMLT.0.2022-07-030>

张洪铭. (2023). 书法国际传播的有效措施探索. *明日风尚* (03), 110-112. <https://doi.org/CNKI:SUN:MRFS.0.2023-03-036>

郑博仁. (2012). 试论对外汉语书法课程教学与实践.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 (04), 87-92. <https://doi.org/CNKI:SUN:XNJS.0.2012-04-018>

周有光. (2002). 《周有光语文论集》第4卷.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韩瑞宝、丁了了)